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研究

主持人语: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不乏用多语、双语,甚至只用某一种外语创作的作家,他们的那类非母语文本作为主流的现代汉语写作以外的特殊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及表达。"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研究"课题,即致力于中国作家外语创作的生态和内在张力的考察,探究中国式的感性与外语思维间的关联,从而揭示这种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文化和审美的新质素。本栏目三篇论文观照了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的三种样貌:《论林语堂的英语随笔与〈中国评论周报〉》借助于一位中国作家在中国本土的英语写作样本,解析它与母语文本的同构关系以及作者文化选择的困境;《差异化呈现与参差的对照——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经验"》勾勒了日本殖民文化统合下台湾作家日语书写的多元构型;《跨文化语境下的"表演":叶君健的外语创作》着力揭示中国作家跨文化语境体验对"他者"视界的融合、对多语创作的影响。以中国以外的读者为接受对象,意味着作家将以一种国际视野和人类意识去建构文学想象的空间。由于中国作家几乎都从中国经验和记忆中汲取灵感,因而他们的作品是为世界形塑了中国的形象。在多元文化日益交汇的当下,对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得失成败及复杂性的研究,将成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借鉴。(倪婷婷)

论林语堂的英语随笔与《中国评论周报》

张 宇

摘 要: 作为《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编辑与重要代表,林语堂在刊物的"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发表了大量英语随笔。他的随笔平白幽默,清畅自然,口语化和小说化倾向明显,带动了"小评论"创作热。作为双语作家,林语堂的中英双语文本具有同构关系,同一时期的中文小品文受其英语随笔的影响;他的双语创作有敏锐的读者意识,也表现出对英语文化霸权的反抗。林语堂的幽默实践具有理想化色彩,其文化选择的悖谬之处也折射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关键词: 林语堂;《中国评论周报》;英语随笔;"小评论";双语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1-0112-11

收稿日期:2017-10-07

作者简介:张宇,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4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论"(13JJD75000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创刊于1928年5月,1940年停刊,后于1945年8月复刊,1946年6月终刊。它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的首任主编是张歆海,之后还有刘大钧、桂中枢,参与编辑的则有潘光旦、马寅初、林语堂、温源宁、吴经熊、林幽、钱锺书、全增嘏等知名学者作家或记者编辑。上海工部局所发行的《政治年鉴》曾视之为"惟一的中国人自有的在国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刊"①。《中国评论周报》在一则广告上称"岭南大学……在新生的英语课上使用它,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一中同样也在课室里阅读它,甚至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也以此作为学习材料"②,可以看出其影响力之广。

在《中国评论周报》中,众多作者为刊物持久的魅力做出了贡献,而林语堂作为《中国评论周报》中声名卓著的代表作家,他出色的英语随笔创作不仅引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英语随笔写作的热潮,在林语堂中英文双语写作生涯中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然而在研究界,与他在美国出版的英语小说、英语文化著述受到较多关注有别,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英文随笔写作却一直未得到起码的重视。

一、《中国评论周报》与"小评论"中的林语堂

《中国评论周报》主要栏目有"社论"(Editorials)、"专论"(Special Articles)、"书评"(Book Review)、"大事记"(Chief Events)等。周刊创办初期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而随着林语堂等人加盟编辑团体,刊物更加注重文化色彩。"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是《中国评论周报》的招牌文学栏目;潘光旦主持的"书评"(Book Review)除关注时政经济外,也关注国外文化艺术类书籍;此外,温源宁在"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专栏的人物随笔,也非常出色。刊物于1931－1932年还增设漫画栏和"艺术与文学"(Art and Letters)、"妇女世界"(Women's World)、"悲哀故事"(Tales of Woe)、"卡桑德拉专栏"(Cassandra Column)等栏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评论周报》努力丰富文本的多样性,力图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为《中国评论周报》所吸纳并发挥较大影响,和这份刊物的人员组成和文化背景的类同性有关。《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和作者中清华毕业生、英美名校的留学生、江浙学者占主导地位。他们有密切广泛的交集③,分享共有的文化理念,希望以文化实践促进中国的进步,彼此形成了一个松散开放的"共同体"。《中国评论周报》坚持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宗旨,标榜"客观"(truthfulness)与"公正"(impartiality),"致力于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同时也要让国人"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④,彰显出世界主义的视野。《中国评论周报》拒斥政治冲突和派系恩怨的表达,曾声称:"在任何话题上,我们没有受到党派、政府或任何商业利益的影响,公平地说,他们从未以任何方式试图影响我们。"⑤《中国评论周报》的作者中既有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胡先骕、萧公权以及同情左翼的姚克、凌岱、全增嘏,也有倾向于右翼的叶秋原等人,然而他们并不在刊物上宣传个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客观理性地探讨问题,拒绝将刊物变为派系斗争的宣传阵地或私人攻讦的平台。纵观刊物所登载的文章,确实基本做到了独立与公正。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语言学论文《汉语单音节性的后果》(Some Results of Chinese Monosyllabism)而受到赏识,后成为编辑团体中一员。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创作包括语

① A Year's Struggle, *The China Critic*, May 30,1929, Vol.3, p.450. 另外,本文正文引用的英文原文的中译,如没有特别说明,均为笔者译。

② P. K. Chu, Subscription by Wire, *The China Critic*, November 22, 1928, Vol.1, p.505.

③ 陈达、张歆海、李干、罗隆基、陈钦仁、陈石孚、潘光旦等皆为清华大学学生;桂中枢、陈炳章、畲坤珊、林语堂、何永佶、邝耀坤、陈立廷、吴经熊、郭斌佳等人皆留学美国;温源宁、伍连德、钱锺书留学于英国;梁鋆立留学法国;宋春舫留学瑞士。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主要在京沪两地高校任教,许多人互为同事。张歆海、潘光旦,温源宁、钱锺书都曾在光华大学执教,林语堂、潘光旦、吴经熊又曾是东吴法学院同事,全增嘏、吴经熊、温源宁、简又文、孙大雨等人又都曾向林语堂的中文刊物投稿。

④ What We Believe, The *China Critic*, May 30, 1929, Vol.3, No.2, p.20.

⑤ D. K. Lieu, Notice, *The China Critic*, April 17, 1930, Vol.3, No.16, p.361.

言学论文、时政文章、书评、文化专论、随笔等等，发表于“小评论”专栏上的随笔尤其受读者青睐。林语堂于1930年开辟“小评论”专栏，作为《中国评论周报》的招牌栏目，“小评论”除了几次中断外①，基本贯穿始终。1935年第4卷17期“小评论”因林语堂访欧而暂停，第21期起恢复，由全增嘏接任编辑。林语堂回国后，和全增嘏轮流任编辑。之后，“小评论”栏目又因战事紧张有所中断②。“小评论”专栏创办初期，其稿件主要由栏目编辑提供。林语堂1936年赴美之后，全增嘏、邝耀坤等人先后担任该专栏编辑，延续了林语堂的编辑理念。1945年8月复刊后的“小评论”主要编/作者有邝耀坤、林安邦、顾缓昌及张培基等。而“小评论”栏目的成功，与林语堂密不可分。

二、林语堂的英语文化随笔与“小评论”

1930－1936年，林语堂在“小评论”专栏发表了大量英语文化随笔，按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一类是文化漫谈。社会批评类随笔包括《中国究竟有臭虫否》(Do Bed-bugs Exist in China?)③《论政治病》(On Political Sickness)④《悼张宗昌》(In Memorial of the Dog-Meat General)⑤《梦影》(A Day-dream)⑥《假定我是土匪》(If I Were a Bandit)⑦等，大多以洒脱之笔触批评中国社会现状，讥刺政坛的黑暗昏聩。这种嬉笑怒骂式的文字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林语堂“语丝”时期“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批评特色，但趣味性更强，语调也更加温和；而“文化漫谈”一些文章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介绍或者中西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⑧《论西装》(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ess)⑨《论米老鼠》(On Mickey Mouse)⑩《半部〈韩非〉治天下》(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⑪等；另一些文章如《阿芳》(Ah Fong, My House-boy)⑫《我的戒烟》(My Last Rebellion Against Nicotine)⑬《我怎样买牙刷》(How I Bought a Tooth-brush)⑭《纪春园琐事》(Spring in My Garden)⑮《春日游杭记》(The Monks of Hangzhou)⑯则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将文化批评包孕于生活琐事的叙写之中，于幽默之中见物理，于琐碎之中见人情。“小评论”时期的随笔是林语堂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捩点，这些作品文风幽默流丽，文字平白简洁，口语化和小说化倾向十分明显，林语堂赴美后的写作风格已在此初见端倪。

1. 口语化、小说化与“小评论”热

林语堂的英语文化随笔文字幽默流丽、清畅自然，在轻松的笔调中透着机智的锋芒，闲谈般的文化比较中透露着开阔的视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不乏锐利勇敢的见解，热情的笔触下流露出豁达与乐观。试举《脸与法治》(What is Face?)为例：

---

① 《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栏目在1931年9月至12月、1932年2月至3月曾有短暂中断，1937年抗战爆发后，“小评论”随《中国评论周报》在18卷停刊。1945年8月《中国评论周报》复刊后的第3期开始便恢复“小评论”专栏，直至1946年终刊。

② 1932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小评论”栏目中断，9期后恢复刊出；抗战爆发后，“小评论”栏目于1937年9月第18卷第10期停办；1945年8月《中国评论周报》在香港复刊后的第32卷第3期“小评论”重又恢复，直至《中国评论周报》终刊为止。

③ Lin Yutang, Do Bed-bugs Exist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February 19, 1931, Vol.4, No.8, pp.179－180.

④ Lin Yutang, On Political Sickness, *The China Critic*, June 16, 1932, Vol.5, No.24, pp.600－601.

⑤ Lin Yutang, In Memorial of the Dog-Meat General,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8, 1932, Vol.5, pp.935－936.

⑥ Lin Yutang, A Day-dream, *The China Critic*, June 15, 1934, Vol.7, No.24, pp.567－569.

⑦ Lin Yutang, If I Were a Bandit, *The China Critic*, August 21, 1930, Vol.3, pp.804－805.

⑧ Lin Yuta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a Critic*, June 30, 1932, Vol.5, pp.651－654.

⑨ Lin Yutang, 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ess, *The China Critic*, April 6, 1933, Vol.6, pp.359－360.

⑩ Lin Yutang, On Mickey Mouse,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19, 1935, Vol.16, pp.278－280.

⑪ Lin Yutang, 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9, 1930, Vol.3, pp.964－967.

⑫ Lin Yutang, Ah Fong, My House-boy,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4, 1930, Vol.3, p.853.

⑬ Lin Yutang, My Last Rebellion against Nicotine, *The China Critic*, November 20, 1930, Vol.4, pp.1119－1121.

⑭ Lin Yutang, How I Bought a Tooth-brush, *The China Critic*, August 18, 1932, Vol.5, pp.850－851.

⑮ Lin Yutang, Spring in My Garden, *The China Critic*, May 10, 1934, Vol.7, p.449.

⑯ Lin Yutang, The Monks of Hangzhou, *The China Critic*, May 4, 1933, Vol.4, pp.453－454.

It is perhaps easier to illustrate what face is, than to give a definition for it. The official in the metropolis, for instance, who can drive at 60 miles per hour, while the plebeians may only drive at 35, is gaining a lot of face. If his car hits a man, and when the policeman comes around, he silently and quietly draws a card from his pocket-book, smiles graciously and sails away, he is gaining greater face still. If however, the policemen pretends not to know him, the official will begin to 'talk mandarin' by asking the policemen 'if he knows his father'(认得你的老子吗?)and his face waxes still greater. And if the incorrigible policeman insists on taking the chauffeur to the station, but the official telephones to the Chief of Police, who immediately releases his chauffeur and orders the dismissal of the little fellow who did not 'know his father' then the state of the official is truly beatific. ①

(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的不可形容了。②)

在这一段选文中,林氏风格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文字直白简练,流畅通达,没有生僻的词汇,没有艰深晦涩的说理,有的只是清通干净的文字;分明是要批判官员僭越法律,借"争脸面"作威作福,却以反讽的语气写来,意味深长又颇有趣味;长短句交叉使用,错落有致,有一定的节奏感;而排比修辞的使用,如行云流水一般使得文章一气呵成;人物动作和对话的加入又使得段落有微型小说的意味。一位骄横无礼、无视法律的"贵人"形象呼之欲出。

林语堂英语随笔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简练生动、清通自然的语言,而这种文风的形成是通过词汇、语法、句法方面的种种策略形成的。从词汇方面看,林语堂所用的大多数都是基本英语词汇,例如《有不为斋》(What I Have Not Done)《女论语》(I Like to Talk with Women)等。他行文不避俗词俚语,常用口语化表达方式,嬉笑怒骂的文字反映了他的洒脱不羁,展现出他的幽默与率真性情。行文常出现英文俚语俗语,比如"crank"(怪人)、"woo"(求爱)、"God knows"(天晓得)、"cig"(香烟)、"go to the dogs"(垮台)等等;甚至出现了粗鲁的脏话"Damn"(去他妈的)等词。语法方面,林语堂常常使用"to do"不定式以及连词这种非正式文体;而除了用词的注意,在篇章结构方面林语堂也力求通俗易懂。极端的如《言志篇》(What I want),林语堂用"I want…"句式作为大部分段落的开头(如"I want some good friends …", "I want a good cook…","I want a good library…")等)③,这些句子只要具备基本英语素养的人都可以看懂,足以见得其文风的平易;而在《竹话》(A bamboo Civilization)中,几乎就是一篇竹制生活用品的词汇表了,罗列了竹子的一百种用处。④ 林语堂直率坦诚与平易近人的文风令人愉悦,而读后却能获得一些有益的思考。

"小说化"是林语堂英语随笔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散文的"小说化"⑤,主要指在散文创作过程中对于小说表现手法的借镜,如鲜明的人物形象、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等。林语堂在英语随笔中显示出了跨文体意识,他将小说与散文糅合在一起,以小说化的笔法抒发真实的情感与思想,拓展了随笔的表现空间。"文体的某些功能,也许是潜在的,在自身范围内找,或许视而不见,而当它在寻求发展的焦虑中,把目光投向他体时,却可能发现自身原可以有此种表现能力,寻找和发现他者,恰是从另一途径或另一种角度发现自我"⑥。随笔中情节的有意裁剪与戏剧性表现,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林语堂擅长以叙事进行说理,这些随笔中的叙事片段多以生动的对话展示,不无小说意味,而大致

① Lin Yutang, What is Face, *The China Critic*, April 16, 1931, Vol.4, No.24, pp.372 - 373.
② 林语堂:《脸与法治》,《论语》,1932 年第 7 期。
③ Lin Yutang, What I want, *The China Critic*, July 13, 1933, Vol.6, pp.836 - 838.
④ Lin Yutang, A bamboo Civilization, *The China Critic*, July 11, 1935, Vol.9, pp.38 - 40.
⑤ 袁晓薇:《文体新变的内部机制和时代精神——从"散文小说化"谈起》,《学术界》,2014 年第 11 期。
⑥ 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217 页。

完整的情节与鲜明的人物也在他的随笔中屡见不鲜。读者一定不会忘记心灵手巧而顽劣成性的童仆阿芳用不同语种接电话的聪明劲儿;公交车上满口新名词、装腔作势的南洋商人令人捧腹;粗野鲁直却不失可爱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让人哭笑不得……这些人物形象个个鲜活,文章的感染力与趣味性自然也随之得以增强。即使是枯燥的政治话题,林语堂用几个"故事"片段便四两拨千斤,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广田示儿记》(Hirota and the Child: a Child's Guide to Sino-Japanese Politics)[①]近乎微型小说,以广田父子对话的推进,揭露日本营造的所谓日中"亲善"假象背后的殖民野心;《论政治病》(On Political Sickness)[②]以黑色幽默讽刺了中国政治要人把装病作为政治筹码的丑态;《假定我是土匪》[③]辛辣嘲讽了中国军阀的"发家史":乡匪时期练好毛笔字,攻城掠地三年可成省匪,内战输诚几次便可成为名阀,晚年讲信修睦宣扬国光,便可成为国际名人。林语堂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政客军阀的嘴脸做了穷形尽相的揭露。此外,《思满大人》《冬至之晨杀人记》《我怎样买牙刷》《春日游杭记》等诸多随笔都有小说化特点,包含着完整的故事意味,以娓娓道来的笔调代替议论,俏皮风趣,形象生动,仿佛与读者闲聊,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了读者和文本的心理距离。

"小评论"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林语堂的知名度也大有提升。作为"小评论"栏目的核心人物,林语堂奠定了小评论的风格基调,并为后续的栏目编辑所坚持。受林语堂文学主张的影响,大批作家加入到"小评论"的写作中,如温源宁[④]、吴经熊[⑤]、钱锺书[⑥]、姚克[⑦]、全增嘏、邝耀坤、张培基、宋以忠[⑧]、何永佶[⑨]、林善德[⑩]、吴道存[⑪]等等,乃至外国知名记者如项美丽等也成为重要撰稿人。其中,全增嘏、邝耀坤、张培基的小评论随笔尤其值得注意,他们既先后担任"小评论"栏目编辑,又是重要的投稿者。全增嘏[⑫]发表在"小评论"专栏的随笔,哲思深刻,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清晰,批评泼辣犀利,具有明快整饬的文风。《中国在1984》(China in 1984)[⑬]模仿乔治·奥威尔的《1984》讽刺中国的专制现状;《中国需要一个计划》(China Needs a Plan)[⑭],嘲讽中国政府人浮于事,使得计划变成一纸空文的荒唐现实;《玛丽说心里话》(Mary Speaks Her Mind)批评女子教会学校只会培养美丽肤浅的花瓶式女学生[⑮];《留学生是中国人吗?》(Are the Returned Students Chinese?)则抨击留学生回国后沉迷物质享受,不关心国家社会与民生疾苦[⑯];《中国一些要人》(Some Persons of Importance)[⑰]《更多要人》(More Persons of Importance)[⑱]以反讽的语调列举了中国的"贵人",其中有蒋夫人(即宋美龄)的裁缝、银行家之保镖,乃至认为侵略上海是"局部事件"的日本人……其笔触老辣,嘲讽抨击之意不难觉察。不管是对社会现状的关注还是对

① Lin Yutang, Hirota and the Child: a Child's Guide to Sino-Japanese Politics, *The China Critic*, March 14, 1935, Vol. 7, p. 255.

② Lin Yutang, On Political Sickness, *The China Critic*, June 16, 1932, Vol. 5, pp. 600 - 601.

③ Lin Yutang, If I Were a Bandit, *The China Critic*, August 21, 1930, Vol. 3, pp. 804 - 805.

④ Wen Yuan-ning, Paper from a Drawer, *The China Critic*, 1935, Vol. 9, No. 5, p. 114; Snippets, *The China Critic*, 1935, Vol. 9, No. 8, p. 168.

⑤ John C. H. Wu, Titbits of Experience, *The China Critic*, April 19, 1934, Vol. 7, No. 17.

⑥ Chien Chungshu, A 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 *The China Critic*, 1934, Vol. 7, No. 44.

⑦ Yao Hsin-nung, I Love Shanghai,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5, No. 4, p. 84; Mrs. Simpson, etc.,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5, No. 12, p. 275.

⑧ I. C. S, The Ill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4, No. 7, p. 157.

⑨ Y. C. H, When Should We Make Love, *The China Critic*, 1931, Vol. 4, No. 12, p. 276.

⑩ Lim Sian-Tek, And Alexander Wept,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4, No. 8, p. 180; A Celestial Phenomenon,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5, No. 14, p. 326.

⑪ Wu Tao-Tsun, On Sincerity, *The China Critic*, 1936, Vol. 15, No. 7, p. 204.

⑫ 全增嘏(1903 - 1984),浙江绍兴人,著名哲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3年至1925年就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27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归国以后,1928 - 1937年先后任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31年起开始担任《中国评论周报》《论语》《天下月刊》编辑。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主要以哲学学术研究与翻译为主。

⑬ T. K. C, China in 1984,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29, p. 739.

⑭ T. K. C, China Needs a Plan,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35, p. 908.

⑮ T. K. C, Mary Speaks Her Mind,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37, p. 974.

⑯ T. K. C, Are the Returned Students Chinese?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42, p. 1028.

⑰ T. K. C, Some Persons of Importance,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15, p. 346.

⑱ T. K. C, More Persons of Importance, *The China Critic*, 1932, Vol. 5, No. 3, p. 823.

文化界的抨击，全增嘏都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与担当。邝耀坤[①]从1937年开始在小评论栏目大量发表作品，他的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同时也不忘关注社会问题。在《东京印象》(Slides on Tokyo)[②]和《东京再记》(More Light on Tokyo)[③]中，他调侃日本低矮的建筑不仅导致了日本人身材短小，也造成日本人性格的压抑；《在校学生的任务》(The Students' Task at the Campus)[④]则指出军训对国防的重要性，学生应该重视军训。邝耀坤的文字平实质朴，不像林语堂的洒脱，也不如全增嘏的泼辣，具有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张培基[⑤]则较多关注年轻人如何适应转变时期的社会环境问题，他的随笔《从大学到豆腐店》("From College to Bean Curd Shop")[⑥]《一位无业青年的独白》("A Jobless Young Man's Monologue")[⑦]《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Lunatic)[⑧]等，写大学生或找不到工作或无法融入社会，幽默而辛酸地描绘出青年人在战时的窘况。《中国——散发恶臭之地》(China--A Land of Stinking Socks)[⑨]和《青蛙的故事》(A Story of Frogs)[⑩]等文章则揭示出抗战结束后中国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情境。尽管这些作者的随笔风格有所差别，但他们都恪守栏目宗旨：关注幽默风味的"小事"，以温润之心行谑而不虐之批评；关注现代生活情境与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关注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以精悍有趣之随笔给读者带来审美享受。

"小评论"专栏的创办及长期存续，与林语堂的理念倡导和创作引导密不可分。通过这个专栏，林语堂不仅传播并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也为他创办中文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与审美经验，是林语堂中文小品文的先导；而"小评论"的风行也吸引了更多知名作家参与其间，形成刊物与作家的良性互动，有力促进了《中国评论周报》在社会中的流通。

2. 形成同构的中英双语文本

研究者可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林语堂的英文创作要早于中文创作[⑪]，他在"小评论"专栏大部分随笔(五十余篇)随后都以中文的形式发表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⑫]。了解这一点，便不难判断，1932－1935年林语堂推行幽默小品大获成功，并非横空出世，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小评论"时期的创作积累，可以说林语堂的中文小品"无论从形式到美学趣味，都来源于其英文随笔的创作"[⑬]；并且也正是因为"小评论"时期的英语创作，林语堂受到赛珍珠的赏识并由此获得赴美写作的契机，1936年以后的著作基本上源自"小评论"时期观点的升华、深化与发挥。之前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到林语堂的双语写

① 邝耀坤(1902－?)，广东蕃禺人，巴满那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商科硕士。历任工商部商标局秘书，卫生部秘书，《中国评论周报》编辑，1934年任国立交通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1949年赴台后曾任台湾"驻伊朗大使馆"参事。1960年调任台湾"驻泰国大使馆"参事，并兼任台湾"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常任代表。1966年任台湾"外交部"顾问。

② Edward E. K. Kwong, Slides on Tokyo, *The China Critic*, June 17, 1937, Vol. 18, No. 12, p. 278.

③ Edward E. K. Kwong, More Light on Tokyo, *The China Critic*, June 17, 1937, Vol. 18, No. 13, p. 290.

④ Edward E. K. Kwong, The Students' Task at the Campus, *The China Critic*, April 1937, Vol. 17, No. 8, p. 180.

⑤ 张培基(1921－)，福建福州人，翻译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同年任《上海自由西报》英文记者、《中国评论周报》编辑、《中国年鉴》(英文)副总编。1946年赴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英语翻译，随后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1949年后在国内从事编译教学等工作。

⑥ Peter Chang, From College to Bean Curd Shop,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0, 1946, Vol. 33, No. 2, p. 26.

⑦ Peter Chang, A Jobless Young Man's Monologue,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7, 1946, Vol. 33, No. 3, p. 42.

⑧ Peter Chang, A Lunatic's Diary,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31, 1946, Vol. 33, No. 5, p. 75.

⑨ Peter Chang, China--A Land of Stinking Socks, *The China Critic*, February 21, 1946, Vol. 33, No. 8.

⑩ Peter Chang, A Story of Frogs, *The China Critic*, 1946, Vol. 34, No. 9.

⑪ 林语堂的第一篇英文创作《南方小村生活》(A life in a Southern Village)，1914年10月发表于圣约翰大学校报《回音》上，随后还有《善波》(Shan-Po, a Story，1915年10月)《昭丽：宿命之女》(Chao-li, the Daughter of Fate，1916年3月)《圣约翰人的偏执》等，这些早期作品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

⑫ 林语堂双语作品目录可参见钱锁桥编《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但钱锁桥称林语堂一生共有50篇双语文本则不太确切，仍有所遗漏，比如《我搬家的原因》(How I Moved to a Flat)《幽默和中国的现实》(Chinese Realism and Humor)等。

⑬ 钱锁桥：《引言》，《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钱锁桥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作,但其中大多数将其纳入"翻译"的研究视阈,参照翻译理论来探讨林语堂的双语文本情况。[①] 然而将双语文本简化为翻译,无疑会损伤甚至取消文本的独立性。林语堂的双语文本并不是简单的字面翻译,这些双语文本"不仅面对的读者不同,语际穿梭本身文章结构、内容上的调整删减,就连写作的时间和重写的语境也不一样"[②],而这些双语文本构成了一种"独异的双向类同关系"[③]。将双语文本进行比照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林语堂文本的特质。

林语堂的英语随笔对于其中文小品提倡"幽默""闲适""性灵"的实践确有直接的影响。30 年代林语堂英语创作获得巨大成功,"小评论"中的大部分英文随笔都被他改写成中文小品,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刊出,而大部分知名篇目都来自于"小评论",例如《脸与法治》《论政治病》《中国有臭虫否》等等。此外,《中国评论周报》编辑经验给林语堂办中文杂志提供了重要的办刊经验和审美经验。林语堂在中文杂志上积极宣扬西方散文写作技巧,在《人间世》开辟西洋杂志文专栏,无不是受到了"小评论"专栏的影响。"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 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古之所谓小品……意见比中国自由……文字比中国通俗……作者比中国普通……","西洋杂志文又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路不可"。[④]从"小评论"栏目序言中也可以看出林语堂双语文本的内在联系:"小评论专栏并不是严格的幽默小品专栏,但它的格调更轻快,内容也更贴近人情常理,作者也因之更得读者信赖。"[⑤]可以说,林语堂的英文随笔与中文小品形成互文,共同践行了"幽默""闲适""性灵"等的文学主张。这些英语随笔,从文化内蕴及文体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林语堂 1936 年以后在美国进行英文写作的基础。

3. 敏锐的读者意识

林语堂有敏锐的读者意识,他注意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的"期待视域",也即关注"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⑥],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注入不同文化内涵。他的双语作品并不完全对应,其间常有所改动增删,改动的部分多在文章开头或者结尾部分。通过不同的文本调整策略,这些作品可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为了照顾外国读者,在处理中国文献、人名时不能像中文创作那样随意,也不适合包含过于繁琐的引文注释,如果运用典故俗语则需要解释说明,有时候还需要铺陈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古代诗文名句人名加以翻译;而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求,也应当将关键语句、关键引文、重要作者或作品以中文夹注的方式加以强调,以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词汇层面,林语堂也特别注意顾及中外不同受众的文化构成、审美趣味。例如"Swedish gymnastics"(瑞士体操)中文对应文本则是"现代人的健身运动","Auspicious Corn"(丰产之角)对应文本变成"嘉禾徽章","the bishops"(主教)对应中文成了"正人君子"。除了词汇方面的改动,在篇章结构上,林语堂也尤为注意。例如在《中国有臭虫否》一文中,林语堂没有像在中文文本中那样进行繁琐的文献考据,而是直接进入主题,这是为了外国读者容易理解。[⑦]《摩登女子辩》(In Defense of the Gold-diggers)英语文本省略了中文文本开头五大段繁琐的考据,直接为摩登女子正名[⑧];在《裁缝道德》[⑨]的英语文本中,为了使得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新生活运动"的荒谬,林语堂详细地引述了汉口市民冀黄光关于服装救国宏论中的五条规定,在中文文本中则一句带过,这里便考虑了中外读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这种文本的改动策略反映

① 例如王正仁、高健:《林语堂前期中文作品与其英文原本的关系》,《外语研究》,1995 年第 5 期;杨柳、张柏然:《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年第 10 期;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5 年第 5 期;王少娣:《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东方主义与东方文化情绪的矛盾统一》,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年博士论文;任东升、卞建华:《林语堂英文创作中的翻译现象》,《外语教学》,2014 年第 6 期。

② 张睿睿:《1930 年代上海的英文期刊环境与林语堂的创作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7 期。

③ 钱锁桥:《引言》,《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钱锁桥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 页。

④ 林语堂:《且说本刊》,《宇宙风》,1935 年 9 月 16 日,第 1 期。

⑤ Lin Yutang, Preface, *The China Critic*, July 3, 1930, Vol. 3, No. 27, pp. 636 - 637. 中文见林语堂:《序言》,《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 页。

⑥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岗中、金元蒲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9 页。

⑦ Lin Yutang, Do Bed-bugs Exist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February 19, 1931, Vol. 4, pp. 179 - 180.

⑧ Lin Yutang, In Defense of the Gold-diggers, *The China Critic*, June 6, 1935, Vol. 14, pp. 917 - 919.

⑨ Lin Yutang, Our Tailor Morality,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0, 1935, Vol. 8, pp. 41 - 42. 中文参见林语堂:《裁缝道德》,《论语》,1935 年第 60 期。

了林语堂对于读者意识的敏感，而正是这种差异化策略，使得他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小评论”时期的林语堂仍然不乏对时政的抨击，而到了美国后的写作更多是对于中国文化、生活哲学的颂扬，他用老中国儿女安逸闲适的生活反衬西人在工业社会下的压力、紧张、异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灵魂的逋逃薮。彼时的林语堂积极地实行在地化策略，更多顾及欧美读者的期待视域，这也是他的作品在西方畅销的原因之一。

副文本的积极使用也体现了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副文本即包括了“正文本周边的扉页题词或引语，序跋，注释，广告，附录，图像，笔名等”①，而副文本的存在“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②。林语堂关于中国书法的介绍、中国语言学的论述中，插入了他手写的众多书法字样，使得随笔对于汉字的特性阐释得更为清晰，一目了然；中文习语、典故、人名等以夹注的形式出现在正文中，调节了文本的呈现形式，起到了一种图文互动的效果。副文本的加入，使得文本变为富文本，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读者也因之有更强的参与感。

4. 中文思维、中国文化的凸显

林语堂在英语随笔中还有意凸显中式思维与中文语言习惯，这体现了他对于英语文化霸权的反抗与身份的自我标示。他常把英文单词看作如中文般的独立单字，按照中文习惯重组，甚至还频繁运用汉语“双音叠词”的手法。不同于英语母语写作者，林语堂用词尤其喜欢成双成对，以求得工整“对仗”与平衡，体现了汉语双音节化倾向对其英文创作的影响。这种例子在他的随笔中比比皆是，如“coldly and humorously”（冷酷而幽默）（出自《半部韩非治天下》）、“frankly and sincerely”（真实坦诚）（出自《言志篇》）、“life and growth, death and retirement”（生存成长，死亡退隐）（出自《梦影》）等等。这种“双音”的用法具有强调意味，加强了表意功能，读来颇有韵致。而“叠词”的用法也非常普遍，叠词能够加强句子的对称美和节奏感，例如“so rare and so delightful”（罕见而愉悦）（出自《言志篇》）、“partly technical and partly literary”（部分技术的部分文学的）（出自《思满大人》）、“mount the Ten-thousand-mile-long-wall and drown my Ten-thousand-mile-long-sorrow”（万里长城万里愁）（出自《梦影》）。这些“叠词”调节了句子的节奏，使全文音律和谐，富有韵律，可以看做林语堂的风格标志。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在英语随笔中频繁使用中文流水句的句法。例如他在《裁缝道德》中写道：“Morality is a matter of appearances, appearances depend on our dress, especially the women's dress, and women's dress depends on the tailor.”（因为今夫天下的道德，胥赖乎今夫天下的服装，而今夫天下之服装，又全凭今夫天下之裁缝。③）这种没有明确逻辑关联的句子在英文表达中极为少见，更像是对中文的直接翻译，有一种别致的趣味。而《上海之歌》《言志篇》《有不为斋》等随笔结构均呈现出流水式的架构，并不讲求段落之间的逻辑发展或者相互联系，而注重于表现整体的思想，这与中国古典散文有一致的美学追求。

此外，林语堂的英语随笔中还加入了很多中文特色词汇或者拼音词，借用翻译学的术语来说，这些词语便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文化专有项”④是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包括地理、生活品、风俗节庆、哲学宗教、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词汇。林语堂创造了“pien-pien-bellied”（大腹便便）之类的中英混合词；他也常常用汉语拼音来凸显语言的“陌生化”，并且很多时候不加注释，突兀出现在文中，如“ren-qing and tian-li”（人情天理）、“bu jiang li”（不讲理）”、“daotai”（道台）、“tufei”（土匪）、“yamen”（衙门）、“tangpu”（党部）、“magua”（马褂）、“youbuwei zhai”（有不为斋）等。除了汉语拼音的使用，林语堂尽量保留这些“文化专有项”的能指，例如“seal's kidney”（海狗丸）、“bamboo-shoot foot and willow waists”（柳腰笋足）、“jin-sen soup and doves-nest congee”（人参燕窝）、“sharks' fin”（鱼翅）等等，这些词语在中国读者看来不难理解，他们对这种具有中

①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44 页。

②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1－72 页。

③ Lin Yutang, Our Tailor Morality,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0, 1935, Vol. 8, pp. 41－42. 中文参见林语堂：《裁缝道德》，《论语》，1935 年第 60 期。

④ Javier F. Aixel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Roman Tavares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 52－58.

国风味的洋泾浜英语文本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而在外国读者眼里,这些词句便多了一层异国情调的色彩,这种跳出英语规范与思维习惯的词句初看很难接受,但也正因为这种变异与突出,文本产生了"陌生化"①效果,"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强化了审美感受,并留下较为深刻的阅读印象。这种有意的努力,意在将中文提升到与其他语言平等的位置,其逻辑在于,既然英语文章中可以引用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习语,那么中式英语乃至拼音也有资格直接进入文章,借此以"表达自身文化身份而进行的双向性的创造实验"②。林语堂还常常将中文中的习语进行直接"翻译",而形成的译文结构与原来的习语完全一致。通过照搬中文结构,将中国思维方式原汁原味地展示给读者,形成一种奇崛之美感。例如在《今译美国独立宣言》(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③里,林语堂直接以中式英语"翻译"美国独立宣言,不顾及语法,如"country affairs daily wrong"(国事每况愈下)、"look up to other people's nostril-breath"(仰人鼻息)、"suck people's juice"(吸民膏)、"I take I ask"(予取予求)等等。这些词语无疑是不合英文语法规则和用语习惯的,然而林语堂却看重这些生造词背后所展现的中文思维特色与中国文化底蕴。林语堂甚至还积极鼓吹洋泾浜英语,并将其视作东西方文化综合的代表。在《为洋泾浜英语辩》(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④当中,林语堂不无夸张地赞颂洋泾浜英语符合世界大同的发展趋势,预言2400年必定会成为"唯一受尊重的国际语言",现行的英语表达如"telegraph"、"telephone"、"cinema"都逃脱不了被洋泾浜词语"electric report"(电报)、"electric talk"(电话)、"electric shadow"(电影)所取代的命运。而在《吾国与吾民》中,他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 don't'。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⑤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构想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林语堂的语言乌托邦情结,在强势的国际语言英语里融入中国文化特色,借此进行跨文化交流与融合,表现出林语堂的多元与包容的文化意识,他既认同全球视野,同时又葆有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眷恋与充分的文化自信。

林语堂1936年赴美之后所写的英语作品里,这些具有中文特色句式、篇章和中式英语词汇虽然有所减少,但中国文化特色仍然在文本中得以保留,仍能看出林语堂有意的文学与文化实践。为了避免被美国主流文化过度同化而导致本民族个性的丧失,林语堂必须利用中国文化特色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做出醒目的"标注"。这种策略式的抵抗,体现了林语堂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坚守。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这些较多涉及中国文化阐释的文本中,仍保留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赛珍珠敏锐地察觉到林语堂文本中凸显的中国思维痕迹,她曾指出《京华烟云》像是从中文直接翻译来的,这其实是因为林语堂在英语文本中有意反映出的中文思维,并以此展示并强调东方文化特色。这种语言实践的背后彰显了林语堂的文化姿态,他希望能够通过在英语中引入中文思维、中文拼音词、中式篇章句法,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摆脱强势英语文化对中文的压迫,挑战英语文化霸权,强化民族身份与自我认同。

三、林语堂的幽默观、文化选择与《中国评论周报》

1930年代林语堂在中文刊物大力提倡幽默文学,积极进行幽默小品的实践,使得提倡幽默小品的刊物风行一时,在当时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关于幽默的文字与"小评论"时期的创作有密切关联。

林语堂对于幽默孜孜以求,不仅以"小评论"为阵地刊发大量幽默风趣的英语随笔,在《中国评论周报》中也发表了多篇文章为幽默造势:《幽默和中国的现实》(Chinese Realism and Humor)抨击中国民众的伪"幽默",敷衍随便,逆来顺受;《思孔子》(Confucius as I Know Him)认为,孔子富有魅力的人格以及

① [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② Javier F. Aixel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Roman A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p. 58.

③ Lin Yutang, 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6, 1932, Vol. 5, pp. 1047 - 1049.

④ Lin Yutang, 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 *The China Critic*, July 22, 1933, Vol. 5, pp. 742 - 743.

⑤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幽默感是他吸引后人的原因①;《论米老鼠》称"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该从严肃文学中排斥出去"②。《中国评论周报》大力推介林语堂的幽默实践。1932 年刊登的广告称《论语》半月刊为"中国唯一的幽默杂志"③,"爱读小评论者不可不读论语"④;同时全增嘏还在"小评论"栏目发表了《介绍论语》(Introducing "*The Analects*")一文,登载《论语》杂志节选,宣传力度不可谓不大。不少作者也对幽默发表过看法,与林语堂的幽默观形成呼应。桂中枢在《中国的幽默在哪里》(Where is China's Sense of Humor)为幽默正名,认为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幽默精神,造成诸多不幸与苦恼,而幽默有助于世界和平⑤;《无泪的哲学》(Philosophy without Tears)⑥一文认为幽默是含泪的微笑;全增嘏则对幽默有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幽默只是《论语》半月刊的手段,讲真话才是目的⑦,他还刊载了古代幽默文集《笑林》故事多则⑧。相应的,林语堂在自办的中文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态度》(1932 年 10 月 16 日)《会心的微笑》(1932 年 12 月 16 日)《论幽默》(1934 年 1 月 16 日)等文章为幽默推波助澜。《中国评论周报》的作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念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语境,扩大了幽默的影响力。

林语堂将幽默与讽刺做出区分:"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刻的"。⑨ 林语堂一再区别讽刺和幽默,反对愤世嫉俗、充满怨怒之气的讽刺,推崇超脱豁达的幽默。然而,他的"小评论"随笔创作却显示着幽默实践的悖谬——他有相当多的作品是讽刺而不是幽默,也就是说,在他的幽默观和幽默实践之间产生了分裂。而由讽刺到幽默的过渡趋势,深层反映了林语堂文化选择的变迁。

林语堂"小评论"时期的随笔,既有"社会批评",也有"文化漫谈",这两类内容各有不同的侧重。社会批评政治色彩较浓,充满了火药味,有极强的批判意识,仿佛匕首与投枪,事实上是辛辣的讽刺。在《哀梁作友》(In Praise of Liang Zuoyou)中,他悲愤地鞭挞道:"饥肠辘辘的志愿军们为他们的满洲里殊死抵抗,张学良坐在北京颐和园里优哉游哉,蒋介石忙着反共剿匪,刘湘忙着和刘文辉打仗,冯玉祥忙着在泰山之巅吟诗,戴季陶忙着欣赏宝华山美景,林森则忙着在南京路的王玉泰买高档茶叶。"⑩林语堂这段话讽刺不可谓不犀利,似乎重回到"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⑪的"语丝"时代。他直接批评国民党当局要员"消极抗日",不顾东北人民死活,这在当时确实冒着较大的风险。其他较为尖锐的作品有《裁缝道德》《论政治病》《脸与法治》《给政客们准备更多监狱》等。这些社会批评随笔保留了"语丝"时期无所顾忌的特色,提刀四顾,直刺现实,批评力度不可谓不大。赛珍珠十分欣赏林语堂英语随笔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与勇敢,林语堂以直率真诚之笔自由地进行社会批评,"在一个批评执政要人确有危险的时期,'小评论'却自由地直言着。……我想那一定是由于藉此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幽默与俏皮才能免遭所忌。这种俏皮——披着他人所不敢言的无畏。在不当宽容时绝不宽容"⑫。

相比之下,林语堂"文化漫谈"随笔,却是地道的幽默,冲淡平和,趣味十足,饱含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他开始有意充当中国的最好传译者。在涉及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随笔中,林语堂自觉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以英语写作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例如在《怎样理解中国人》(How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中国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人》(The Chinese People)《论西装》(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ess)《论裸体运动》(Confessions of a Nudist)等文章中,林语堂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眷恋与维护,这种情感表达明显标示了与"语丝"时期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差异。

---

① Lin Yutang, Confucius as I Know Him, *The China Critic*, 1931, Vol. 1, No. 4, pp. 5 - 9.
② Lin Yutang, On Mickey Mouse,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19, 1935, Vol. 16, pp. 278 - 280.
③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13, 1932, Vol. 5, No. 41, p. 1101.
④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29, 1932, Vol. 5, No. 39, p. 1021.
⑤ Kwuei Chung-shu, Where is China's Sense of Humor,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23, 1930, No. 43, p. 1019.
⑥ Eugene Shen, Philosophy without Tears, *The China Critic*, July 16, 1931, No. 29, p. 684.
⑦ T. K. C., Introducing '*The Analects*', *The China Critic*, December 8, 1932, Vol. 5, No. 49, p. 1303.
⑧ T. K. C., Chinese Wit and Humor, *The China Critic*, August 1, 1935, Vol. 10, No. 5, pp. 113 - 114.
⑨ 林语堂:《论幽默》,《论语》,1934 年第 33 期。
⑩ Lin Yutang, In praise of Liang Zuoyou,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20, 1932, Vol. 5, pp. 1219 - 1220.
⑪ 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1925 年第 57 期。
⑫ 赛珍珠:《偶语集》序,今文编译社译,上海:朔风书店,1941 年版,第 2 页。

林语堂赴美后这种自觉代言人意识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出来，而立场愈益温和。他在美国的创作，基本都是文化漫谈类的，告别了“语丝”时期的“锋芒毕露”，笔下更多流露出温情与怀旧。他所描绘的中国生活，已经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成为文化中国的想象与呈现。这种理想化的情境展览，是他者的镜像，也是自恋的凝视。因此《吾国与吾民》涌动着浓郁的文化情结；《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中没有恶人形象，全是理想的老中国文明的具象呈现；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几乎成了“被抽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内核而成为包裹着异国情调的审美对象”①，仿佛屏风上的金丝雀，它是美丽的，却终究缺乏生机。他甚至将人类文化的未来寄托于“幽默”，认为幽默能够“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而借由幽默，人类能够创造一种“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的文化，由此所有的争端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林语堂试图借助幽默的文学文化实践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人类问题的万能灵药，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林语堂的前后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小评论”时期的创作显示了他立场与态度的过渡。他摇摆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标准来过滤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过滤西方文化，徘徊于西方文化本位和东方文化本位之间，难以作出取此舍彼的断然选择”③，这种不断的徘徊反顾导致了他矛盾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观念。他始终在中西文化的交界处歧路彷徨，既是西方精神文明的自我放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放逐者。他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具有普遍性。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评论周报》编辑部在社论中曾倡议建立“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具有国际眼光的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与文化而聚合到一起，探讨现代社会共有的人生问题。俱乐部只开放给有自由世界主义思想的人；比起赞颂国族，他们对检视观点更感兴趣；比起爱国宣传，他们更关注现代生活共性问题”。④ 但这种美好的设想却缺乏坚实的社会支撑。事实上，随着 1937 年后战争局势的紧张，这种本不坚实、凌空高蹈的关于世界主义的玫瑰色构想就失去了滋长的土壤。所谓“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的构想最后只能容纳编者/作者群体，“它只对于中产阶层有吸引力，但不是当时主流风尚”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跳跃的想象中进入了全球领域。然而，这种对话的本质只能是虚幻和想象的”⑥。这种理想化的文学/文化实践最终只能沦为了一种无力的姿态，更多演示了 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滋长的文化乐观与自信心态。现代中国处在一种碎片化的“半殖民主义”⑦的图景中，而正是在这种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种种力量冲突的缝隙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顽强地挣扎与突围，不断地试图确立主体性与自我认同，这种探索总是充满了挫折与反顾，他们也往往处于矛盾的撕扯之中。

尽管如此，林语堂以及《中国评论周报》作者所进行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仍旧值得尊重。他们表现出多元文化的意识、世界主义的胸襟、包容开放的文化态度，在整个世界都陷入战争的狂热危机时尤其难能可贵。而作为《中国评论周报》的中坚人物，林语堂以英语写作进行的“跨语际实践”⑧，是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的可贵尝试，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的成功印证。

（责任编辑：素微）

① 施萍：《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45 页。

②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名著全集》第 21 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99 页。

③ 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69 页。

④ Proposal for a Liberal Cosmopolitan Club in Shanghai,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13, 1930, Vol. 3, p. 1086.

⑤ 钱锁桥：《引言》，《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钱琐桥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 32 页。

⑥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23 页。

⑦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3 页。

⑧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 1 页。